

古代战场上 马尾巴为何都要打结？

——马年说说出土文物中有关马的故事

马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之一。在六畜中，马居首位，在传统文化中，马的象征意义也多是正面形象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距今4000年前的黄河上游甘肃地区已经出现了驯化的家马。在此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，马已成为人类行旅代步、农业生产、交通运输、邮驿传递和战争博弈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。在丙午马年，我们根据考古出土材料，来讲一讲与马相关的故事。



1

马尾巴的故事

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与马打交道的机会不多，仅仅从影视作品中见到骑马驰骋或金戈铁马的场景。在先秦时期，马不光是交通运输工具，马匹的多少也代表着国力与国防力量的强弱。文献记载的“千乘之国”，也不是简单千辆车与千匹马的组合，而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体现。当时以四马一车为一乘，驾车的四匹马，中间两匹称“两服”，左右的两匹称“两骖”。《诗经·郑风》中有“两服上襄，两骖雁行”的诗句。意思是驾车的中间两匹服马抬起头，两侧的马比服马稍后，排列如雁飞之行列。从诗句中也能反映出当时四匹马拉车的组合位置。这四匹马合称“驷”，成语中“驷马难追”的“驷”就源自这里。

山东在先秦时期古国很多，能达到千乘国力的诸侯国也有。高等级贵族死后采用车马陪葬的制度盛行当时。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级别最高、保存最完整的车马坑是滨州邹平市东安遗址出土的一号车马坑。出土一车辆，四匹马，配备四个銮铃，四副马冠，正是一乘。每匹马身上都精心配备了青铜马胄、马鬃、马衔、络饰、胸饰，马尾上有精美的海贝装饰。上面提到的出土文物

中，銮铃是西周时期马车上的必备器物，由铃球、铃颈、銮座组成，它通常安装在车辕或衡木部位，当车马行进时，铃球碰撞铃腔发声，声效类似鸾鸟鸣叫，用以警示行人并安抚马匹，具有装饰性与实用性双重作用。銮和轡是连在一起配套使用，銮在马口中，轡在口外，口两边一边一个。轡的末端与牵马的缰绳相连，目的是控制马行进中的方向，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“马嚼子”。

当时的战马在作战前，都要把尾巴打个结。这是因为马在战场上快速飞奔时，如果尾巴散乱，到处乱飘，会经常缠绕住其他东西。马尾巴扬起时也会影响战车里作战人员的视线，耽误战机。但马尾巴又有实际作用，不能剪掉，因此在上阵前，都要把马尾打结。《左传》中记载的齐晋鞌之战，就是因为站前没有把马尾巴打结，而酿成了大祸。事情是这样的：鲁成公二年（前589年），晋景公派郤克率八百乘兵力联合鲁军追击齐师。六月十七日，双方在鞌地（今济南黄冈、北马鞍山一带）决战。齐顷公轻敌冒进，晋军主帅郤克中箭负伤仍坚持击鼓指挥，晋军士气大振，齐军崩溃，仓皇东逃，晋军穷追不舍，从

现在济南北边黄冈跑到东边华山，围着华山转了好几圈就是不算完。给齐侯驾车的逢丑父和齐侯换了位置，以便在不能逃脱时蒙骗晋军。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齐侯的车子快到华泉的时候，两旁的驷马尾巴又被树枝挂住了，齐侯的“司机”逢丑父因手臂有伤，不能下来推车，被晋军的韩厥赶到车前，想俘虏齐侯，因之前逢丑父与齐侯调换了位置，把逢丑父当成齐侯俘虏了。结局当然是齐国败了，齐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因素很多，但在逃跑时，驷马尾巴没打结被树枝挂住导致车不能行，无疑是致命的。

再返回来看看出土的文物。1978年平阴县孝直镇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立马，浑身浑圆劲健，身上还饰有云纹，但看看马尾巴，却是打了结。济南章丘危山出土的西汉兵马俑中，陶马的尾巴也是打了结。我们熟知的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，马首高昂，嘶鸣仿佛穿透青铜；躯干饱满，肌肉线条在静默中蓄积着力量；马尾扬起，如旌旗飘拂，扬起的马尾也是打结的。马尾打结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唐代还见诸文物，著名的唐太宗陵前昭陵六骏，也都是束结马尾。

2

马政改革

前面提到的驷马战车虽然称雄于先秦时期，但它本身也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。首先是车体笨重，容易损坏。同时驾御困难，御者靠双手执六辔，要靠专门训练。战场也只能选择在空旷平坦的原野才能开展，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，笨重的战车就无用武之地了。在战斗中，也常见因车马被林木绊阻而全军乘员皆遭敌俘获的事例。到战国末期，钢铁兵器的出现和强弩的使用，也对战车极为不利。加之新兴步兵和骑兵开始在战场上显示威力，战车日趋衰落。当年赵国的赵武灵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才有了胡服骑射的重大改革。

到了秦汉时期，骑兵的作战时效性和机动进攻转移速度已经明显凸显。

单辕驷马战车彻底失去先秦时期作为军队主力兵种的地位，最终遭淘汰，退出战争舞台。但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以来一直以农耕为主，他们并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从小就进行骑行训练，其骑射水平当时是低于北方游牧部落的骑兵。这种改观从秦汉开始，到魏晋十六国时期已经有了明显变化。改变这种局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当时的马政，二是新马具的发明改良。

先说马政。西汉初期马匹短缺，加之中原马匹在体型和速度上难敌北方游牧部落的战马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西汉朝廷致力于马政建设，推动养马业的繁荣。汉高祖时建立了严格的马匹牧养和管理制度，吕后时期更是禁止母马流出，以保护国家军事资源。汉文帝时

期，晁错建议通过“马复令”鼓励民间养马，以减轻国家养马负担，通过免役政策推动民间养马之风复苏。汉景帝时期，实行了“马弩关”规定，限制马匹规格，扩大边境牧马苑，进一步扩大军马资源。到汉武帝时，一个宏伟的战略得以推行：不仅要击退匈奴，更要主动打通西域，引入良种名马，从根本上改变现状。张骞“凿空西域”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。汉武帝听闻大宛有汗血宝马，不惜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远征，终得宝马三千。这些来自西域的马，蹄质坚硬耐磨、体型高大，更善走平稳的“对侧步”，是装备重甲骑兵的理想选择。通过引入西域良种，在河西走廊的草场上，与本土蒙古马杂交，培育出了新的良种名驹。

3

马鞍与马镫

新马具的发明改良主要是指马鞍与马镫。马背呈“两面坡”，尤其是马在奔跑或跳跃时，人骑在上面稳定都很难保持，就不用说再挥动武器或射箭了。所以骑马离不开鞍具。最初并无鞍具，骑手直接骑在马的裸背上。应该从战国时期，开始出现皮质或其他材质的坐垫或软鞍。软鞍的使用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骑手胯部与马背的摩擦，为骑手提供了些许缓冲。两汉时期，这一类型的马鞍被继续使用。到了东汉末至三国初期，开始出现高桥马鞍。高桥鞍除了能给人稳定的依托，还能减轻马匹不适。这种马鞍骨架结构包括前、后鞍桥以及两块鞍座板，均为木质。鞍下与马背接触面还有一层软垫，这就是鞞。北朝民歌《木兰辞》中描述木兰替父从军，“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鞞”。说明在北朝时期，鞍鞞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。

马镫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，有人甚至说马镫的发明开启了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。在没有马镫的时候，骑马是一件苦差事，当快马疾驰时，骑手坐在马上，脚是悬空的，只能双脚夹紧马身，并用手紧抓缰绳，才能防止从马上摔下来。大约在汉魏时期，开始出现了原始马镫。马镫和马鞍是相辅相成的，有了马鞍，从马鞍左前方垂下一根皮条，下端结成圈形套扣，作为上马时蹬踏之用。因只有一只，又谓之“单镫”。单镫的出现改变了此前上马时需要按住马背一跃而上的方式，但单镫还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。到了十六国时期，开始出现了双镫。考古发现的青州体育场墓葬、北票冯素弗墓等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双镫。青州体育场墓葬出土的马镫是铜铸，镫柄上部有一小孔，小孔以下依次篆刻有三角纹、龙纹，镫环上篆刻一周忍冬纹。冯素弗墓出土的双镫是用桑枝揉木为镫后外包鎏金铜片。由单镫发展成一边一镫，从而进一步解放出骑手的双手，可以靠双脚控制平衡在马上冲、刺、劈、击，大大提升了骑兵的战斗力，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骑马人的安全。马镫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马具的完备，对骑兵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4

马戏与舞马表演

古代的马在人类社会中承担着不可缺少的功用。驾驭马车的技能练习在周代已上升到贵族层面。当时贵族教育六艺中的御，就是驾驭马车的技能。东周时期盛行的大田之礼，是以田猎形式进行军事演习，兼具军事检阅与法律制定功能，驾马的演习表演必不可少，也促进了马戏的诞生。到了汉代，随着马匹需求扩大，与之相应的马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以表演为目的的马术运动——马戏也经常出现在杂技表演和娱乐活动中。从考古发现来看，最精彩的莫过于沂南北寨画像石墓中的马戏表演。表演者在两匹四蹄腾空、飞奔相向的骏马上，一人站立在马背，手挥长鞭，另一人在马背上呈倒立状态，手里还拿着兵器，显得精彩而又刺激。

唐代承袭汉代传统，注重培育良马，供军事之需。同时社会开放，歌舞盛行，舞马这一娱乐形式在唐代风靡一时。唐玄宗时期每逢千秋节庆典，数百匹身披锦绣、佩戴金银饰物的舞马随《倾杯乐》起舞，完成衔杯跪拜、登床旋转等高难度动作，形成“舞马衔杯祝寿”的经典场景。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看到此景，曾创作过流传千载的《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》。出土于西安何家村金器窖藏中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，壶腹两侧各篆刻一匹鎏金舞马，马匹后腿屈坐、前腿直立，鬃毛披散颈部系飘带，口衔酒杯呈跪拜姿态，极具生动奢华之美。从唐代舞马表演到今天仍在延续的马术表演，都向世人展示着人类对马文化的推崇热爱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